# **谢益清：审读人物关系悲悯人类困境——《装在套子里的人》之教学新解**

契诃夫《装在套子里的人》以漫画笔法塑造了古板、守旧、害怕新生事物的别里科夫这一人物形象，成为古今人物画廊的典型。这一形象无疑是对现实高度浓缩提炼的，即“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”（恩格斯语）。有研究者将其概括为“蜗牛人格”，即“过度的自我保护，结果反而使自己孤立起来，毁灭了自己”；但人物的典型化又往往造成了人物的标签化。笔者以为，在阅读教学中，我们不妨暂时地抛弃原有的审美成见，引导学生换一种审辩的眼光去重新认识别里科夫。作为读者，我们是这个故事的旁观者，我们拉开了审视的距离，所以教师才获得一种清醒的理性。对小说主要人物形象的价值认知，应该作为本文的教学重点，而这理应抛弃固有的标签，重新去审视。从人物关系入手，别里科夫的人物关系并不复杂，主要有三方面：

一、与群体的关系——“平庸之恶”

别里科夫与整个中学的同事乃至全城人群体是怎样的关系？文本中有两个鲜明的动词足以体现：“降服”和“辖制”。文本用一种对比的手法来表现别里科夫的“降服”，是一弱一强，是以弱“降服”强。别里科夫“唉声叹气”“垂头丧气”“苍白的小脸”都是弱者的写照，而这样的弱者却“凭着”这弱，“降服”了“有思想的、很正派”的“我们”这些教师群体——至于“辖制”。文本从时间上和空间上来表现其“覆盖”的时空之广，时间上“足足十五年”，空间上不仅“整个中学”，“全城”都受着他辖制！而且，原文还用了九个“不敢”来表现全城人对他的“怕”。

  面对这样的现象，我们不禁要质疑，这样一个“穿着雨鞋、拿着雨伞”的“小人物”缘何会有如此强大的能量？素来解读这篇作品的许多人，把这归结于别里科夫背后的“当局”，即沙皇专制制度。这个解释当然是符合时代背景的，但需要补充的一点是，“我们”“全城人”都“怕”，不敢反对，只有沉默，这些“沉默的大多数”才更值得我们去反思。而这样一大群人的沉默是如何“养成”的？原文给了我们提示，是“全城”大范围的相互传导，是“足足十五年”的承续，这种沉默已经早早扩大开来，并且习之日久，“我们”终于习惯而至于近乎甘心受其“降服”与“辖制”，甚至于还极力为别里科夫撮合结婚之事。而相比于普通大众的沉默，“有思想的、很正派的”人们（如知识分子）的沉默往往比“别里科夫”式的“套子”要可怕得多，这种沉默一个接一个的传导，逐渐形成了整个社会的“共谋”。于是一个小人物都可以轻易地“辖制”整个社会。政治思想家汉娜·阿伦特认为罪恶分为两种，一种是极权主义统治者本身的“极端之恶”；第二种是被统治者或参与者的“平庸之恶”。其中第二种比第一种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沙皇专制制度即第一种，而“我们”这个群体共同的“怕”即一种“平庸之恶”，因为这是一种对显而易见的谬误或者罪恶的默许。而这种默许无疑纵容了恶。“极权专制取消了人的个体差异性，使之变成不会思考、不会判断、不会反抗的原子式个人，无数个原子式的个人聚合成乌合之众，构成了极权统治的群众基础”，因此，小说中的“我们”同样需要批判，甚至于比别里科夫更应该遭到批判。

笔者认为，审视这层人物关系时，与学生一起去探讨挖掘这层深刻的内蕴，显然更具思想价值。不要忘了，别里科夫，用原文的身份界定，他只是一个希腊文教师，只是一个“小人物”，而“我们”才是一个更庞大的群体。对群体行为进行反思，通常都要比对某个个体行为的反思要更具普适性与深刻性。而把所有的罪过都推给一个小人物，笔者认为，这是不公正的，而这一点价值判断，在教学中应该引导学生去探究发现。

二、与叙述者“我”的关系——人际困境

人教版课文的注解提到，这篇小说是借中学教师布尔金同兽医伊凡·伊凡尼奇的谈话叙述的别里科夫的故事，课文作了删节，保留了谈话的大部分内容。课文中的叙述者“我”也就是中学教师布尔金，而他只是上文提到的群体的其中一员。

布尔金与别里科夫两人的关系颇值得玩味。他们是同事关系，而且“同住在一所房子里”，可见，他们是很亲近的。因此布尔金了解别里科夫的方方面面，对其生活“套子”和思想“套子”非常熟悉。我们再细读一下就会发现，两人甚至可以说是形影不离的，如文中叙述别里科夫住处的情况时提到“他通宵做噩梦，到早晨我们一块儿到学校去的时候……”，还有漫画事件之后“我们一块儿走出了宿舍”。

  然而，令人感到矛盾而不解的是，布尔金在叙述时说“跟我并排走路，对他那么一个性情孤僻的人来说，显然也是苦事”，两个同住一屋还常同出门的人并排走路居然会觉得是苦事！这句话读起来是略带揶揄的。我们不妨试着从布尔金的叙述语气里来揣摩这两人的关系。课文节选部分第一句“我的同事希腊文教师别里科夫两个月前才在我们城里去世”一句中的“才”，带有鲜明的主观色彩，这似乎是盼着别里科夫早点死呢！（当然，有的译本是没有“才”这个副词的，在此不论）还有叙述结婚事件时说“这个装在套子里的人，差点结了婚”的“差点”也是值得细细玩味的，略带嘲笑，又有点矛盾，既希望别里科夫结婚，或许有跳出“套子”的可能；又似乎庆幸别里科夫结婚没成功，否则大概也要把华连卡装进“套子”里了。联系这句话的上文，说的是“跟我并排走路，对他那么一个性情孤僻的人来说，显然也是苦事”，跟一个挺亲近的同事并排走路都是苦事了，那么和一个女子结婚一辈子，那得是多大的苦事呢！这样一联系来看，“差点”似乎包含着潜台词，就是别里科夫这样的人本不该考虑结婚这种事的。

  读到这里，我们不禁心生怜悯，怜悯的原因是，通观整个故事，别里科夫并没有什么朋友，唯一比较亲近的也就布尔金了，但布尔金在人后说起别里科夫却是如此这般的语气。或许只能说是道不同不相为谋，两个人身体可以亲近，而思想和心灵却相距遥远。面对华连卡姐弟俩骑自行车事件，一个是“脸色发青发白”，一个是“平心静气”，一个说“成何体统”，一个说“让他们快快活活地玩一阵好了”，两人思想上的天壤之别也就可见一斑了。

布尔金虽然有清醒的认知，了解别里科夫的缺点和弱点，但是他并不给予别里科夫任何劝告和帮助，而只有鄙视和嘲讽。仅从布尔金和别里科夫的关系，我们不难窥见别里科夫所面临的人际困境。这种困境无疑也造成了别里科夫的巨大孤独感，而这种孤独感使之更为孤僻自闭，躲入“套子”中寻求一种安全感的弥补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别里科夫是被他所存在的社会抛弃，人在这种处境之下，往往很容易走向扭曲和异化。到底是环境驱逐人还是人自绝于环境？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，但在教学中需要引导学生设身处地去体察的是：别里科夫，一个小人物，在这种人际困境下，他是孤独的，是无力的，更何况他本就“性情孤僻”。

三、与华连卡的关系——婚姻的彷徨

华连卡姐弟是从城外来到城内的“新”人。他们是故事中唯一还没有在“足足十五年”受“辖制”的社会氛围中浸淫的两个人，可谓一种异质元素。因此，他们在作品中是作为别里科夫的对立面而存在的，尤其是柯瓦连科，是别里科夫与华连卡之间的最大障碍。柯瓦连科作为一个进步、自由、勇敢的青年，“从认识别里科夫的第一天起，就讨厌他”，因骑自行车事件，两个人从对话冲突到肢体冲突，其本质当然是思想上的根本性冲突，是进步与腐朽、自由与束缚、勇敢与怯弱的冲突。课文删掉了他对别里科夫的一大段议论：“我不懂你们怎么能够跟那个爱进谗言的家伙，那副叫人恶心的嘴脸处得下去！……我是要走的，你们呢，尽可以跟你们的犹大在这儿住下去，教他遭了瘟才好！”这一顿臭骂酣畅淋漓，可以看出柯瓦连科对别里科夫是怎样的深恶痛疾。两个人的性格显然是水火不相容的。柯瓦连科最后的一推，别里科夫最后的一滚，可以说是别里科夫婚姻幻梦终结的开关闸。

  华连卡与别里科夫的关系，起于婚事，终于婚事。原文对华连卡有一段刻画，课文删掉了。华连卡“那么活泼，那么爱热闹；老是唱小俄罗斯的歌，老是笑。她动不动就发出响亮的笑声：‘哈哈哈！’……”一个美丽活泼、开朗大方、爱说爱笑的姑娘形象跃然纸上。值得一提的是，“哈哈哈”的大笑只不过是华连卡的一种习惯，却在最后给了别里科夫脆弱的精神致命一击，“结束了一切事情”。这是颇为讽刺的。

小说还有一段两人刚认识的情景描写（此略），颇为动人。这段描写让我们有理由相信，两个人是互有好感的。令人疑惑的问题是，两个个性截然不同的人为什么能互生好感。课文选文部分提到，华连卡对别里科夫，是第一个“待他诚恳而亲热的女人”，而且对别里科夫“明白地表示好感了”。究其原因，课文节选部分的文本提供的可以聊作依据的是“在婚姻方面，怂恿总要起很大的作用”。但另一方面，我想，华连卡活泼开朗、简单率真、没有心机的个性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，也只有这样的姑娘，他人的撮合怂恿才能真正地起作用。华连卡的这种个性颇有意味。一方面，她是率真，没有心机的；另一方面，她遇事不问前因，不问后果，可笑则笑，不免愚蠢。

  这样的姑娘，我相信对别里科夫一开始确实是有吸引力的，因为全城都没有过这样的姑娘，全城的人“都不敢大声说话”。华连卡在这死水里搅起了一股微澜，带来了一阵清风，想必也确实拨动了别里科夫的心弦。从别里科夫的那句“使人联想到古希腊语言”可以读出，一开始他对华连卡是有认同感的。而且，文本告诉我们，别里科夫还曾把华连卡的照片摆到桌子上。我相信，孤独灰暗的别里科夫是渴求爱情的，只是他在人际困境中缺乏对人际关系的把控力，这大大削弱了他经营爱情与婚姻的信心。他说华连卡的“性子很野。结婚倒不要紧，说不定可就要惹出麻烦来了”，其实摒弃成见地看，别里科夫还是有自知之明的，他在对婚姻作理性的衡量，所以“没求婚，一个劲儿地拖延……他时时刻刻在估量将来的义务和责任，同时他也差不多天天跟华连卡出去散步，也许他认为这是在这种情形下照例该做的事吧……”我们从中可以看到，别里科夫对爱情婚姻既迫切渴望又害怕失败，不主动求婚但又继续保持交往，这种犹豫彷徨逃避拖延正是他内心懦弱、缺乏担当的一种表现。

  渴求而不去追求，希望而害怕失望，这是别里科夫个性的悲剧。华连卡应该是他走出“套子”的唯一机会，但他的“套子”实在太厚重了，他已无力挣脱。所以结局是可想而知的，柯瓦连科只不过顺便帮忙“推”了一把而已。其实那一推，反倒让别里科夫从婚姻的彷徨中解脱出来了。

1. 总结

当我们不贴意识形态的标签，当我们重新审辩地分析别里科夫的人物关系，我们看到的是：在庞大冰冷的制度机器和与之格格不入的社会环境中的一个卑微、怯弱、可怜的小人物，是怎样在“平庸之恶”中放大自己谬误的“套子”，在人际困境中孤独无助地扭曲灵魂，在婚姻的彷徨中走向最后的坟墓。别里科夫的可笑，也就多了一层令人悲悯的普适意义：人的困境——人的挣扎——人的无力。别里科夫式的“套子”成为人类的一种普遍困境，而这足够让我们所有的人共生悲悯。

  继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，解读这个文本时引向悲悯是否将弱化文本批判的力度？如前文论及，如果说别里科夫该受批判，那么故事中的所有人，包括故事的叙述者布尔金及全城其他的人，都该受到批判，因为是他们的“共谋”，“塑造”了别里科夫这样的人物，所有的人都起了“推波助澜”的作用。在笔者看来，批判的最高境界应是走向更为广阔的悲悯，因为悲悯是包容所有，批判他者即批判“我”。比批判他者更有价值的，是自我解剖。

  因为，人类的困境是普遍的，而人性的弱点是相似的。每个人都是人生迷途中的一员，无一例外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别里科夫即我，我即别里科夫。笔者认为，在这篇小说的阅读教学中，应该从以上三方面对人物关系的分析与认识中，引导学生去探究更普遍的人类困境，培育出更深广的悲悯情怀。